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知识
分子

Zhi Shi Fen Zi

大众传媒

—YU DA ZHONG CHUAN MEI—

徐国源 路鹏程 刘怡 等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传媒浪潮研究

知识
分子

Zhi Shi Fen Zi

大众传媒

— DA ZHONG CHUAN MEI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 / 徐国源, 路鹏程, 刘怡, 董丹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2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ISBN 978-7-5068-2634-1

I. ①知… II. ①徐… ②路… ③刘… ④董… III. ①知识分子—
关系—大众传播—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D663.5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3153号

责任编辑 / 庞 元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胡 玥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 (总编室) (010)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世纪千禧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 16.75

字 数 / 230千字

版 次 /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知识分子的传媒图像 // 1

第一章 初涉传媒：报刊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

- 第一节 从“文人”到“报人”：
早期报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 8
- 第二节 自治的共同体：
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 // 25
- 第三节 名利场、革命界与公共领域：
知识分子与报刊的关系 // 53

第二章 空间转移：知识分子与电视讲坛

- 第一节 现场转换：知识分子走上电视 // 66
- 第二节 电视特性与文化传播法则 // 85
- 第三节 传媒机制与“知识传媒化” // 102
- 第四节 再论“电视知识分子” // 124

第三章 汇入网络：知识分子的“无形学院”

- 第一节 网络：寻找另度空间 // 136
-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网络镜像 // 148
- 第三节 网络“公共性”：学术与思想的融通 // 160



第四章 问题化：知识分子与传媒公共空间

第一节 “公共性”视域中的知识分子 // 176

第二节 专业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 // 201

第三节 作为“文化监护人”的知识分子 //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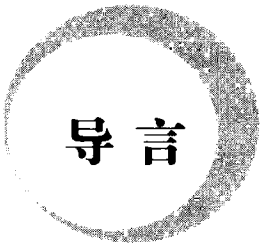
附录二篇

论传媒时代的文化范式转换与价值偏向 // 232

后现代背景下的知识生产与人文批判 // 243

参考文献 // 252

后 记 // 258



导言

知识分子的传媒图像



自知识分子近代诞生开始，他们与传媒的合作和互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有学者提出，“知识分子的诞生以及知识分子阵营的形成，便是和大众媒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在西方社会，这种借由报刊、电视等传媒使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观点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的传统百年来从未中断，从萨特、布尔迪厄，到苏珊·桑塔格、乔姆斯基等学者，都在延续着这种传统。较近的例子如美国“9·11”之后，苏珊·桑塔格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乔姆斯基也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情绪的言论。

在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渊源同样悠久，自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近代报纸的践行，《申报》、《新青年》、《大公报》、《晨报》、《语丝》、《现代评论》等报刊就和中国革命、中国历史文明的进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借由这些发言的阵地，李大钊、陈独秀、傅斯年、鲁迅、张季鸾等这些兼具教授、学者、作家、社会活动家、报人身份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将中国命运的众多思考、科学民主的思想、对封建旧文化的批判带入到社会公共议题中，发出了当时社会纷繁的时局中知识分子掷地有声的言论。李欧梵通过考察近代以降知识分子与媒体的关系指出，“它非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2]李欧梵还特别提到了报纸副刊对于形成中国“公共舆论”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通过每日刊行的副刊占据舆论“中心”位置，借助“对抗性”的“游戏文章”和各种现代新文体参加现代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像缔造。它虽不是枪杆，但迎合了追求新知识的国民的集体心理，营造出一种召唤性的共通的想像，从而逐渐在文化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效果。

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变和发展改革进程，这一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总体上一直得到了良好的传承。尽管“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尚有争

[1] [法]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段慧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3页。

[2] 李欧梵：《现代性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



议，但正如陈平原所说，自19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80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1]而这种社会参与和超越学科专业的表述，同样借由报章杂志等大众传媒来实现。这其中最可能的原因是，报刊与书籍一样，具有文字传播载体的特性，且能更快速地传播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对此，马克·波斯特曾作过解释：“书面文本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劝导性的亲自出场下进行的，因为书写能够使人对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扰，从而能促进冷静的思考而非冲动的热情，因为书面文字是物质的、稳定的，这就使得信息的重复接受成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机会……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2]可以说，在印刷媒介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交往一直是深入而良好的。

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以及视觉媒介的感官冲击，则用短短的时间就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印刷媒介在这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它颠覆了人们的信息传递和接受模式，重构传播法则，真正地扛起了大众文化的大旗。电视在重塑这个世界主流媒体规则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定义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倘若从媒介的变迁史去考察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上电视虽不是知识分子与传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合作早已有了自己的传统，但这种“传统”随着传媒中心时代的到来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症候：两者的合作关系并没有消失甚至愈加密切，但以何种方式合作，谁决定这种合作关系和方式，则已成为厘定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关键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从电视时代开始，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开始进入全新的合作时期。

电视，这个被波兹曼称为“元媒介”^[3]的媒介，是怎样在传媒中心时代的逐步演进中扮演着自己无可替代的角色，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重构中，电视又是怎样打破了原有的秩序与传统，创造了一种与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合作形式？这，恰恰是我们倾力关注的问题。《百家讲坛》作为一个“活”的标本，提供了我们考察知识分子在电视中心时代面临的各种价

[1] 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页。

[2]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115页。

[3] 元媒介在波兹曼的书中指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见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04页。



值命题的“范本”；而近年来有关“电视知识分子”的热烈讨论，实质表明了人们对于“媒体霸权”侵蚀知识文化传播的隐忧和警惕，以及对于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传媒巨影、以保全“真身”的理性思考。

关于传媒中心时代的种种描述，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加码，但诸多经典的预言式论述大多还是来自麦克卢汉所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者。对于这个大众媒介当道的年代，托马斯·德·曾戈提塔在《中介化》这本书中不厌其烦地带我们浏览了媒体所充斥的社会的每个角落，揭示媒介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与我们生活的方式。“它的外延始终是在拓展之中，它的内涵则似乎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全部环节，甚至是你私生活中最细微的角落……它塑造着你的宇宙观，影响着你对爱、对死亡的全部认知。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耗费人的任何精力也不需刻意努力，却是一个持续无休止的过程。”^[1]

网络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更是空前。它使得一个前现代社会的思想中心的重心不断下移，由精英独霸的格局转变为平民大众的参与和自我成全。但与此同时，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网络新媒介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衍变，在本质上并不改变人类的精神指征，相反，由于网络的出现，它所裂变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及问题，却仍植根于现实的矛盾纠集之中，有待我们用历史的法则去追问和探究。

李欧梵曾预言：21世纪是网络文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上网在所必然。由此他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与网络传播的一连串基础性追问：知识和网络的关系究竟如何？知识分子自设网站，是否又将扮演另一种启蒙的角色？这种经电子媒体中介而制造的“启蒙运动”，是否会使知识变质，或将知识立即转化为权力？网络是否会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空间？或能否构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性”和民主的建构有何关系？它所提供的“共时性”是否可以促进多种意见和声音的表达？而众声喧哗的结果是导致自由讨论的空间扩大还是缩小？^[2]上述可称为网络“基础追问”的问题，显而易见，却不见有人深思反省。网络发展至今，知识分子的网络栖居已蔚然成风，如对于上述根本问题人们不作回应，显然已无法廓清当今网络文化矛盾纠结的状况，更难以梳理出中国知识分子在21世纪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1] 托马斯·德·曾戈提塔：《中介化》，王珊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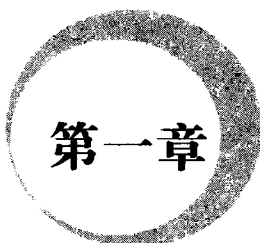
[2] 李欧梵：《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10月号，第40-41页。



鉴于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今天我们似乎有理由从两者合作互动、相互建构的视角，借以勾勒、梳理这段历史。我们的基本设想是：（1）考察传媒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衍变的踪迹，分析报纸、电视与网络时代的传媒制度从建构、固化到弥散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传媒生存的状况；（2）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对知识分子如何经由传媒管道进入公共领域作较为全面深入的考察，勾勒知识分子的传媒图像，进而讨论在传媒制度影响下，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衍变；（3）探究传媒知识分子进入文化公共空间的机理和实际状况，分析传媒制度、新闻框架等因素对知识分子发表言论、表达观点、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4）思考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身份”难题和社会伦理困境，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说框架，建构出有实质意义的理论命题，提出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观照视野；（5）讨论知识分子该如何介入传媒公共空间，并坚守“自主性”“公共性”和“文化监护人”等知识分子职能，引出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进而对中国知识分子自我重建提出策略性的思考。

需稍作说明的是，由于本书是由徐国源、路鹏程、刘怡、董丹合作撰写的，所以既会有各自的发现和创见，也必然会存在观点和材料的“撞车”，如此，本书中难免出现一些引述和案例的重复，是需要读者原谅的。另外，为记录每个人付出的劳动，这里也把各章节的撰写情况略作说明：框架、体例和写作风格的拟定，以及本书导言和第三章的撰写，由徐国源完成；第一章由路鹏程撰写；第二章由董丹撰写；第四章由刘怡撰写；最终由徐国源和路鹏程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新的媒介改造着世界，也将我们带入了一个高智能的社会。今天，我们已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传媒消费时代。基于这种状况，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注定将成为一个未竟的话题，仍待深入探讨。



第一章

初涉传媒：报刊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



第一节 从“文人”到“报人”： 早期报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

晚清报业发轫之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不知新闻纸为何物，尚不知阅报为何事”，甚至“报不取值而犹乏人惠阅。”偶有阅识者也大都以为报刊仅是茶余饭后之谈助，“不觉读报有何种利益”。^[1]报刊是茶余饭后之谈助，无足轻重，以报为业之人自然也不足挂齿。更为不堪者，乃是“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2]左宗棠斥责报人是“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3]社会目之报人“不顾廉耻的斯文败类”。^[4]

报人身份卑微，但文人身份尊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是传统四民社会之首。晚清文人或因屡试不第，仕途无望，或因遭逢变故，生计无着，总之，只有流落到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之际才委身报刊。但是，随着报业的兴盛，人们对报人的观感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文人愿为报人，乐为报人，并将其作为终身职志。如《申报》馆的何桂笙、钱昕伯、黄协埙、张蕴和等，《新闻报》的李浩然、严独鹤等，均执笔政数十年。即使初以业报为耻的王韬后也以作为报人而自豪，放声高歌：“千古文章心自得，五洲形势掌中收。”^[5]那么，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从文人的身份认同转化为报人的身份认同？

identity，有学者译为身份，亦有学者译为认同，且各持己说，各成一家之言，殊难论断孰是孰非。^[6]本文统而称之为身份认同。“身份就是一

[1] 黄天鹏：《新闻学刊全集》，《民国丛书》（二编），第48辑，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78、394页。

[2]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7月15日。

[3]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上海商务书店1925年版，第35页。

[4]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52页。

[5] 王韬：《扶桑游记》（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

[6] 关于identity译词的争论可参见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沈晖：《当代中国中间阶层认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从个体来看，认同一种身份，即意味着要承担起这种身份所赋予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与其相关一整套行为规范。从群体来看，身份认同以其特有整合方式能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2]

身份认同是个多学科交汇的论域。哲学追问身份认同的终极价值和根本意义，宣称身份认同即“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社会学研究生身份认同的社会因素及身份认同产生的社会功能，指出身份认同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3]心理学则探索身份认同的内在动机和动力机制，认为身份认同“即把自己看成是所期望的对象，并表现出与对象类似的态度和行为。这是一种将对象内投的心理机制。”^[4]哲学和社会学构成身份认同研究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极，心理学则成为沟通两极的桥梁。本文试图藉多学科纵横交错的立体视角来观照和展示晚清早期报人身份认同的演进过程和途径，凭借这种多学科融会贯通的分析合力来探索和揭示晚清早期报人身份认同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身份认同的产生过程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的双重特征。身份既是由地位、财富、权力、声望等外部的客观实体因素所决定，同时也取决于对自我身份构成的主观认识。^[5]如哈贝马斯指出，身份“不是给定的，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设计。”^[6]卡斯特甚至说，“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即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身份建构中的重要作用。^[7]当下学者认为晚清报人身份认同端赖于

[1]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89. 转引自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 荆其诚主编：《简明心理百科全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页。

[5] 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6] 哈贝马斯：《新历史主义的局限》之“与J·M·费里的对话”，见哈贝马斯：《自治与团结》，伦敦：弗叟，1992年，第243页。转引自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7]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持相关论点的思想家还有克尔恺郭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相关讨论参见[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4页。



社会进步、报业发展、报刊影响增大、报人收入增多和地位提高等客观实体性因素，^[1]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即报人自己如何界定、设计、想象他们的身份，如何定位理想中的自己，特别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报人身份建构与认同中的功用与意义。

尽管纵览晚清八十年，就整个报人群体而言，报人身份认同的困境始终挥之不去，但晚清末季，随着科举废，新政兴，报业勃兴，现代化转型在社会各个层面全面展开为报人身份认同创造出越来越有利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而晚清早期报人要在封建势力重重困厄中创榛辟莽建构身份认同，其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其所遭遇的思想震荡和身心磨难，远非后来报人所能比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极富勇气和智慧建构出的报人身份奠定了中国现代报人身份认同的起点和框架。

须指出的是，认同的心理过程具有群体性，其特点是一群人同时产生这样的心理认知并相互影响。^[2]因此，本文所分析的晚清早期报人身份认同与建构，即晚清早期报人群体的身份建构与认同。并且，这里所说的晚清早期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指的是一种典型认同。即萧功秦先生所说的，这种典型既不是每个晚清报人个体身份认同的总和，也不是这些个体认同的平均值。换言之，由于每个晚清报人的人生际遇、生平抱负、个性气质各不相同，各人身份认同的程度是不同的。尽管如此，这种认同既然是从大多数晚清报人的认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它当然为大多数人所共有。^[3]

一、我是谁：早期报人的身份认同与形象建构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4]因此，身份自我认同首先要追问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5]

[1] 赵建国：《分解和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43页；王敏：《上海报人社会生活（1872-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9页。

[2] 孙频捷：《身份认同研究浅析》，《前沿》2010年第2期。

[3]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碰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89. 转引自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与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 李慧敏：《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认同与教育——以吉登斯自我认同理论为视角》，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晚清时期，凡新报创刊都会刊布“自述”“缘起”“告白”之类的文章。史家在研究报刊时非常重视这类文章，常得之则喜，失之则怅，因为藉此方可全面了解报刊创办旨趣、理念和意义。^[1]而自身份理论观之，“自述”“缘起”“告白”这类文章自述、自传性质的文章，反映出报人如何看待自己、认识自己、追问我是谁，即如何建构自我认同的身份形象。《申报》1872年5月6日-8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申江新报缘起》、《招刊告白引》、《本馆自述》。《循环日报》甫一创刊，则两天内接连刊布《本馆日报略论》、《倡设循环日报小引》、《本局日报通启》、《本局告白》等文章。报刊创刊伊始，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展示自我，阐释自我，彰显出报人建构自我形象的急切和重视。

身份认同的核心内容包括其特定权利、义务、责任、行事规则，以及身份合法化的理由。^[2]报人是业报为生之人，报人的身份内涵是他们从事的报业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赋予的，即报刊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报人身份的内涵，提供了其身份合法化的理由。因此，报刊刊布的“告白”“自述”“缘起”必定会详尽地阐释一番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早期的报刊更是不厌其烦地一再申论报刊的功能和作用，强调报业的价值与意义。如《申报》自创刊始，《本馆告白》连登三天，反复昭告，“新闻之作固大有益于天下”。^[3]《循环日报》甫一创刊，宣扬报馆“有俾于国计民生”的功能和作用。^[4]这些刚从士人蜕变而来的报人们不约而同地都站在“益于天下”的立场，赋予报刊“俾于国计民生”的功能和作用。这固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民的中国士大夫传统担当意识的体现，更是因为直接从事报业活动而对这种新型传媒的社会功能的体认和反思。报人在论述中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报刊的作用，这虽然是由于受主客诸条件所限，报人尚对报业缺乏科学的认知。但从身份认同来看，不失是一种颇为高明的建构身份的策略，报人借强调报刊功能的重要来凸现自己身份的显要。

[1] 朱传普先生在研究《述报》时，因“找不到创刊号，不禁大失所望”，旋而得之，则喜出望外。见朱传普：《记〈述报〉——一张不载于报史的重要报纸》，转引自李瞻：《中国新闻史》，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477页。

[2] 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5月2日。

[4] 《倡设循环日报小引》，《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报刊的功能与作用赋予了报人身份的内涵和边界，决定着其权利、义务、责任和行事规则。既然报刊的功能和作用如此这般巨大，意味着业报之人必然应当享有广泛而重大的权利。报人权利的核心，或者说报人核心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但这又恰是晚清政府控制报人活动关键之所在。因此，想象和追求新闻自由权利，成为晚清报人在众声喧哗中建构自我身份的焦点。《循环日报》宣称，“凡时务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1]自从中国最早的一代报人祭起言论自由大旗，尽管因时因势，时伸时绌，或扬或卷，但是始终不坠。报人业报动机不同、办报宗旨迥异、报业职志殊别，并且随晚清时局的变化，报人对报刊的功能作用、报业的价值意义的认识和期许有所不同，但获取言论自由始终是晚清一辈又一辈报人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理想。

无论是以中国儒家传统言责精神为张本，还是借鉴西方现代权责政治思想，对晚清报人来说，权利与责任始终是相辅相成。王韬在引介英国报业情况时，指出英国报人责任重大，“（社会——引者注）每随（报刊——引者注）褒贬为荣辱、颂讥为轩輊，操觚者盖有合于人心天理之公然，则所系岂不重哉”。^[2]

报刊的责权利必须通过具体的报业规范方能在报人的实践活动中真正贯彻落实。为此，晚清早期报人提出了一整套报业实践规范。以政论声动天下的王韬提出新闻评论的写作要旨，“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3]《申报》则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闻采写的准则，“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观者明白易晓，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4]具体而言，即：新闻特性以真实与客观为是，新闻价值以新鲜与奇特为尚，新闻语言讲求措辞浅近晓畅，行文平实简练。

报刊关系“国计民生”之大业，报人身膺经世济民之大任。因此，对报人的综合素养提出严格要求。政论时代的报刊，其声誉的隆衰，影响的强弱取决于其言论水平的高低。因此，关于报人素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司

[1] 《本局日报通启》，《循环日报》1874年2月5日。

[2] 《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

[3]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99页。

[4] 《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